佈滿禁忌的雷區，動輒獲咎的後果使涉足者日少，就算膽大包天者進入了也舌捲入喉不能放開了說。如果不擺脫此類模糊印象和政策定性，跳出文藝描寫的刻板記憶，要想作出自有見解的論文是不可能的。當然，閱讀關於「文革」的書籍文章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近年來隨著「文革」歷史的慘痛記憶漸漸遠逝，樣板戲、東方紅等作為那個特定時代標誌的「紅色經典」，以及「文革」中風頭一時的浩然小說等，在沉寂了二十年後重又赫然回到了生活的前臺。名為反思「文革」而實際為「文革」遮遮掩掩的回憶錄，不時露臉於各種報章雜誌。相應的是，悍然為「文革」合法性張目的新 X 派論著，也以為弱勢群體代言的資格招搖過市。而與此相反，那種毫無避諱又不為任何特定利益集團所左右的獨立研究，在我們這裏是少之又少。在龍蟲相雜、泥沙俱下的文林書海中，年輕一代學人要去研究「文革」已經遠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了。所以在張景蘭的開題報告通過以後的一段日子裏，我們交流的話題主要不是「文革」題材小說及其研究，而是「文革」運動本身。我們探討「文革」的社會定性和歷史影響，我們討論「文革」災難的集體心理機制和個人內在情欲，我們思索「文革」發生的民眾責任和和領袖個人責任，等等。

想想真是令人不寒而慄，「文革」結束距今不過區區三十年還不到，「文革」親歷者大部分還活在世上，而作為過去了的歷史的「文革」真相就已然模糊迷離得恍如異世了。「文革」的發動者明明出於其個人的權欲而將一個大國拖進了一場大動亂，導致了十億中國人虛耗了十年生命，使社會的發展停頓了整整十年。而在這十年裏，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等周邊國家與地區，走上了高速發展的現代化道路。噩夢結束，看著人家的現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次

序 i

引 言 1

第一章 災難與新生

——撥亂反正語境下的「文革」敘事（1977-1984） 9

第一節 「報春花」與「日食」 10

第二節 「苦戀」與超越：知識份子視角 21

第三節 政治合法性與農民視角 46

第四節 辯護與自省：紅衛兵視角 59

第五節 悲壯的青春與精神的家園：知青視角 78

小 結 94

第二章 文化反思與人性自省

——主體性與現代化語境下的「文革」敘事（1984-1992） 103

第一節 「文革」隱喻——烏托邦的建構與破滅 107

第二節 底層「文革」和文化尋根 123

第三節 啓蒙批判與荒誕敘事 136

第四節 苦難意識與人性自省 151

第五節 紅衛兵視角的敘事變調 166

小 結 185

第三章 解構與懺悔
——世俗化和「告別20世紀」語境下的「文革」敘事（1992-2002）
..... 189

第一節 權力鬥爭：破譯「文革」的新密碼.....191
第二節 「告別革命」和性話語狂歡.....211
第三節 「躲避崇高」與知識份子精英形象解構.....227
第四節 民間視野下的「文革」形態.....241
第五節 「無神時代」的靈魂自審與救贖.....256
小 結.....267

結 語.....271

參考文獻.....275

附錄一：主要涉及作品.....283

附錄二：「文革」題材小說研究學術綜述.....287

後記.....29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引　言

在古希臘神話中，天地之女、記憶女神摩涅莫緒涅，與眾神之王宙斯結合而生下了掌管文藝的九位繆斯女神，於是，戲與舞、歌與詩，就都歸於摩涅莫緒涅的懷抱了，記憶因而成為人類歷史的母親和源泉。不論英雄業績，還是浩劫災難，在記憶中都可以豐富人類的智慧和精神寶庫，使之用於建立美好的家園。那麼，對我們中國人而言，剛剛過去不久的「文革」這一中華民族的苦難，是否以及如何成為我們民族的歷史記憶？是否已經化作我們真正的精神營養，從而使我們更為警覺產生這種災難的社會和文化土壤？

顯然，很少有人能對此輕易作出肯定的回答。雖然「文革」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已經離我們而去了，但它留給國人的記憶與影響卻是痛切而深遠的，「文革」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抹不去、繞不開的歷史與心理情結。對「文革」的記憶、闡釋與評價，至今仍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然而，隨著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快速變化，人們自然更多地把目光與興奮點投注到新的現象與話題上了，思想文化研究領域對時代的追新逐異也遠遠勝過對歷史的反觀深思，這看起來似乎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正如「二戰」是西方思想與文化研究的豐富資源，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哲學、藝術和宗教，「文革」作為一面鏡子對

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人性、心理等的映照，同樣值得深入地思索與反覆地追問，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出發點。而一個相當重要的現象是，除了國內外歷史學、政治學對「文革」的研究成果之外（其中的禁忌和空白也顯而易見），「文革」十年結束以後，對「文革」的文學表達（主要是小說），已經構成了當代政治文化、思想史和文學藝術大觀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的得與失、敞開與遮蔽也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相對而言，對「文革」題材小說的批評與研究卻顯得比較冷落和薄弱。

對「文革」題材小說的單篇或多篇研究開始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末，與當時的創作同步，但對「文革」題材小說進行綜合性專門研究，以「文革」敘事文本為材料來進行思想史、政治史包括文學史的研究還是 90 年代以後的事。其中最為重要的專著是許子東先生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 50 篇文革小說》。該著作借鑒普洛普分析俄國民間故事的結構主義研究方法，以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有代表性的 50 篇（部）「文革」題材小說為對象，從它們對「文革」敘述的災難起因、災難降臨方式、拯救主題、反思——懺悔、敘事模式等五個方面進行了分類、歸納和闡釋，總結出這些作品敘述「文革」的基本結構單位和不同組合方式及其背後的深層文化心理，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在研究方法、角度和意義闡釋等方面都有著開拓性的意義。但由於採用的是敘事學研究方法，缺乏對「文革」敘事變化的縱向研究；而且，由於寫作時間的原因，對 90 年代以後的「文革」敘事現象，其中的結構功能和敘事模式的歸納，就無法涵蓋和解釋了。同時，由於方法和角度的限制，對單個作家作品的差異性、獨特性

也未能顧及。其他涉及「文革」題材小說總體性研究的著作和論文，或主要針對傷痕、反思文學時期的作品，或對某一特殊類別題材如知青題材、知識份子題材的研究，或對某一階段中一組作品的研究等。縱觀既往的「文革」敘事研究，可以看到還存在著以下幾個薄弱環節：對「文革」敘事作縱向的貫穿性研究較少；明確地梳理和揭示「文革」敘事形態與政治文化語境的內在關聯的研究似未出現；對「文革」敘事作品的總體性評析和個別性差異相結合的研究較弱。這些也正是本書的研究重點和學術旨歸。

本書的理論前提是新歷史主義的基本設定：「我們所認為的歷史不是可以重新獲得的事實的領域，而是一種由歷史家／闡釋者以各種方式將文本化的痕跡聚合起來而形成的構造物」，「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們，我們對歷史和現實本身的接觸必然要通過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無意識中的敘事化」[2]，所以，歷史被看作是一種敘事和文本，歷史是產生的，而不是發現的。因而，對歷史的敘事就必然帶上作者的闡釋觀念和價值取向，而這種觀念和取向又往往是時代政治文化、意識形態語境的產物，植根於社會意識與權力關係之中。歷史敘事是如此，以虛構與想像為主要手段的文學敘事更是如此。可以說，對「文革」進行敘事的小說作品就是把那段不同尋常的歷史記憶置於一個想像性的解釋模式下，通過不斷的講述試圖理解那段歷史情境中的政治、社會與人生、人性，以對抗「文革」在生活之流中被遺忘的趨勢。同時，這種闡釋歷史、認識人自身的敘事行為也參與了

---

1 《文藝學和新歷史主義》第 99 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

2 弗・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第 26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新的歷史進程，構成了新的現實文化語境和當下政治話語。正如詹姆遜所說：「一切文學，不管多麼虛弱，都必定滲透著我們稱之為的政治無意識，一切文學都可以解作對群體命運的象徵性沉思。」

從這一理論基點出發，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十年結束以來到本世紀初（從 1977 年至 2002 年），隨著政治文化和文學語境的變化，作為對「文革」歷史的記憶、闡釋與虛構，以「文革」為題材的或為主要背景的小說創作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撥亂反正」話語下知識份子與國家意識形態同步「共振」時代的「文革」敘事；現代化和主體性話語時代的「文革」敘事；世俗化和「告別 20 世紀」歷史語境下的「文革」敘事。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基於同樣的歷史經驗卻產生了不同的形態和價值判斷，其間的變異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並置起來看竟會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可以說，作為「文革」記憶的獨特形式，小說以其豐富、真切的感性經驗和複雜、多樣的理性思考構成了「文革」的一種敘事大觀。日本政治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說過：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裏，最能夠有效地處理思想史所難以企及的材料的，正是文學研究領域[4]。我們也可以說，對「文革」歷史的不同階段的不同敘事（包括同一階段的不同敘事），其間顯現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含量恐怕是其他文化領域所難以替代的。

---

[3] 弗·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第 59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4] 孫歌：《文學的位置——丸山真男的兩難之境》，《學術思想評論》第 3 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文革」敘事在本課題中是指以「文革」為題材或背景的敘事作品（主要指小說），包括以反思「文革」為出發點而上溯到1957 年以後的「反右」、「大躍進」、「四清」、「社教」等政治運動的小說作品，而如此界定的邏輯前提是：「文革」在政治理念上並非只是這十年的特有產物，而是由戰爭年代延續下來的高度組織紀律化和權力集中化的政治結構，和把社會矛盾的解決訴諸暴力和群眾運動的革命形式，在建國後特別是 50 年代中期以後不斷升級、強化、激化後的極端發展。

「文革」的主導理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是依靠「大民主」即群眾運動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消除一切社會私有形式和個人私有觀念及其政治支持者，建立高度純潔的社會主義國家，防止社會主義「紅色江山」「變修」、「變色」，這實際上是 20 世紀 50 年代就開始描述的共產主義或「純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大地上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也體現著從 50 年代的民族工商業國有化、農村人民公社化再到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化的一貫邏輯。所以說，「文革」並非突然發生的政治怪胎，它是戰爭經驗延續到和平建設年代的革命理念推向極致的形態。簡言之，「文革」實際上是發動者試圖排除一切政治異見，通過對人的改造和體制改造，建立「純粹」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政治實驗，具體體現為政治上全面組織生活（以所謂大民主和高度集權既控制官僚階層又鉗制民眾）、經濟上全面計畫生活（消滅體制上的一切私有形式及其萌芽狀態）、文化上全面統一生活（改造私有觀念、排除思想異端），而這種政治理念事實上的結果「是把人的全部生命（甚至包括人的肉體需要及其經濟的滿足）都服從於嚴格的、抽象

的、統一的道德公正原則的理想。……它不是豐富生活，而是破壞生活和使生活貧乏化。」[5]

同時，在實踐層面上，「文革」又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複雜的權力和利益爭奪，是「比賽革命的革命」，「革革過命的人的命」；而且不只是一群人革另一群人的命，還是一場全民族的「革命」與「被革命」的循環混戰，帶來權力鬥爭的循環與普遍的傷害。它的產生既是領袖個人意志在強制性政治體制下的極端實踐，也是 1949 年後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矛盾的產物，幾千年封建文化培養出的國民精神是它的滋生土壤，所謂階級鬥爭哲學和「以階級鬥爭為綱」，則為之提供了意識形態合法性和正當性依據。

對這段歷史的深入研究在當今中國仍然有這樣那樣的客觀困難，而敘述「文革」的小說（以下簡稱「文革」敘事）則以其特有的方式與角度從政治、文化、人性、心理等多方面對之進行了反省、深思、記憶與想像，構成了一個極其重要而獨特的當代文學乃至當代思想文化景觀。對這一文學發展脈絡的疏理、辨析，發掘這些文本背後的深層意識結構和政治無意識內涵，並揭示它們與相應的政治文化、文學語境的內在聯繫與制約關係，正是本書寫作的學術要旨。本書以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理論為基礎，著重採用詮釋學、敘事學理論與方法，把對文本的意識形態分析和形式研究結合起來，通過對文本的深層詮釋、對敘事縫隙的尋找以及對文本和語境之內在關聯的把握，揭示諸多「文革」敘事

---

5 （俄）弗蘭克：《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第 125 頁，徐鳳林譯，學林出版社，1999 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